



总顾问/张书珩

主 编/刘人杰

中国文学史

(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中国文学史

(第二卷)

总顾问：张书珩

主 编：刘人杰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第三章 陶渊明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更盛，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大，出现了孙绰、许询等一系列作家，他们“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玄言文学占了文坛的统治地位。这种文学在内容上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严重地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的陶渊明，才给文坛带来了富于现实内容、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

第一节 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其曾祖陶侃出身寒门，虽以军功官至大司马，仍为士族不齿，讥为“溪狗”、“小人”。他的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一类官职，但到了陶渊明，家境早已破败。他笔下五柳先生的“环堵萧然，不蔽风雨；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先生传》），正是诗人自己生活的写照，故肖统谓之“实录”（《陶渊明传》）。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正是门阀制度全盛时期，当时人材的进退，根本不以德才为依据，而要看门第的高下和财产的多少。“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不是大贵族官僚地主出身的人，即使做到某些较为富庶之县的县令，也会受到非难，更不可能得到重要官职。这些大贵族官僚地主们“或假财色以交权豪，或因时运以佻荣位，或以婚姻而连贵戚，或弄毁誉以合威柄。器溢志盈，恣发病出，党成交广，道通步高。……所未及者，则低眉扫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抱朴子：疾缪》）。在这些腐朽的官僚们的统治下，政治极端黑暗。当权的大臣们不断地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和残杀。从东晋王朝建立一直到它的灭亡，统治者内部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孝武帝司马曜即位以后，起初是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接着是桓玄夺取了政权，最后又是刘裕起兵消灭了桓玄和代晋自立。这一系列流血政变，都是陶渊明所耳闻目见的。这种社会现实对陶渊明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统治者有过幻想，希望通过出仕的途径，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宏愿。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像他那样出身贫寒的人，不可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在几次出仕的过程中，使他逐步看穿了那个黑暗与腐朽的社会和他是格格不入的。在《感士不遇赋序》中他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

陶 淵 明 像



陶淵明

阉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这段自白，是他的心情最清楚的说明。他的归隐本是对现实极端失望之故。正因为“大济于苍生”的理想无法实现，他才走了“击壤以自欢”的道路。

陶渊明出生时，家境已经衰落，生活贫苦。他曾在所作《杂诗》中说：“忆我少年，无乐自欣豫”。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他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当时他的家境日益贫困，但还维持着一般中小地主的生活。家乡的庐山、彭蠡湖（即今鄱阳湖）培养着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这两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他早年的生活和情趣，陶渊明早年对于老庄学说很感兴趣，同时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抱着建立功业的幻想，他说：“少年罕大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可见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像尧舜盛世一样。

陶渊明年轻时就是怀着这种“大济于苍生”的志向走上仕途的，他尊重孔子的遗训，“奉上天之诫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间”（《感士不遇赋》）。他曾做过江州祭酒，终因洁身自守，不满意官场的污浊，任职不久就辞官而归。

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不就。可是陶渊明对统治者的幻想并没有完全破灭，他的壮志也没有消失，所以大约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他又第二次出仕。这次他来到江陵，做了荆州和江洲刺史桓玄的幕僚。桓玄掌握着长江上中游各州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准备夺取东晋的政权。陶渊明发现他并不能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对他准备扮演的篡弑丑剧也很憎恶，于是又产生了归隐的念头：“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正好陶渊明三十七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按照古代的规矩，陶渊明又辞去官职，丁忧回家。

陶渊明三十七岁到四十岁。在家乡过了三年隐居的生活。这时期他的心情很愉快，写了不少诗。他开始参加劳动，并把很大精力放到农业生产上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时运》等优秀诗篇都是这时写的。

在陶渊明隐居的这三年里，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402年，桓玄举兵东下，攻陷京师建康，次年称帝。

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克复京师，并乘胜追击到江陵，杀了桓玄。这时刘裕做了镇军将军，掌握着东晋大权，给国家带来一线希望，就在这年陶渊明做了刘裕的参军。这是陶渊明第三次出仕，他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怀着幻想和希望；另一方面又疑虑重重。《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一诗就是在这种心情下写的。诗里说：“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可见他作了再次归隐的思想准备。大概陶渊明同刘裕仍然合不来，不久就改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

405年，陶渊明四十一岁时做了彭泽令，但在任仅八十余日，终于因为他看透了

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深刻地体验了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险恶，自知济世的抱负难以实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杂诗》），便毅然辞官归隐园田。他在《归去来兮辞序》里说：“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风波未静”这句话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忧虑。

在做县令的期间，他的心情是很痛苦的，《归去来兮辞序》说：“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恰好十一月郡里派了一名督邮来到彭泽，督邮是负责督察检核县务的官，位轻权重，非常跋扈。县吏告诉陶渊明说：“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解去印绶，辞官回家了。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的辞官归隐经过是：

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辞》。征著作郎，不就。

从陶渊明的前后期著作看，他的归隐思想产生于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清楚认识，于是一种反抗手段。这时儒家的“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导的地位。从他放弃了大济于苍生的理想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性，但从他坚持高尚的志趣，决不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来说，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正因为他把壮志埋藏在心里，所以一直没有忘却现实，常常流露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同时，道家思想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论成分，认为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灭变化，否定道教的长生永视之说和佛教的神不灭的思想，这是他进步的方面。但他由此出发而采取的“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却是具有消极作用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明他处在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想用这种态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脱于现实之外。但黑暗污浊的现实不可能使他的思想得以实现。于是理想与现实便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贯穿着他的一生，即表现为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

陶渊明归隐以后，生活上又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农田不断受到灾害。四十四岁那年，他的旧居又被大火烧毁，生活日渐艰苦，于是只得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

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他叙述自己的生活情况是“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有时他甚至不免于乞食。忧愤、饥寒、劳累一起折磨着垂老的诗人，使他“遂抱羸疾”。

陶渊明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步地接近了人民，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农民思想和愿望。“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

表现了他与农民朋友的亲密关系。由于他亲身经历和体验了农民的疾苦，他对人生的认识更深刻了，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他又在诗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因思想认识提高，精神气质也得到升华。他也看透了社会的黑暗。晋末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看望他，这时陶渊明已经饿了好几天，起床都困难了。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答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赠以粱肉，陶渊明麾而去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骨气。然而陶渊明饮酒、采菊，看似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诗人在“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贫病交迫中离开人世，享年六十三岁。死后被谥号为“靖节征士”。

陶渊明的一生除了现实生活的影响外，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对其都有显著的影响。陶渊明的政治抱负本是继承着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后来归隐，也正是实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在他的《五孝传》等著作中，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色彩。另一方面，他又接受王充等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道家蔑视富贵的思想。他的“乘化委运”，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和老庄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局限于儒、道两家的范畴。他既没有儒家鄙视劳动的偏见，也不取道家放纵的行为。在当时思想界，他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形、影、神》诗，说神和形的关系是：“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强调精神依附于形体。这种思想和慧远等佛教徒主张的“形尽神不灭”的学说（《弘明集》卷五）正好相反。据《莲社高贤传》载，慧远曾劝他参加莲社，他却“攒眉而去”。慧远结交的都是些大贵族官僚分子，陶渊明当然不屑和他们交往。他们与陶渊明的学术思想上有分歧，也正是社会地位不同的表现。

第二节 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历来论诗的人都把陶渊明看作“田园诗人”或“隐逸诗人”。的确，在他现存的一百二十多首诗中最为人们所传诵的大多是歌唱农村景色和村居生活的作品。早在诗人归隐以前，他已经在诗歌中表现了对这种生活的向往。例如：《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就有“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的句子。这时候，诗人已经出仕过两次。对官场的丑恶已有相当的认识，弃官归隐的念头业已酝酿成熟。所以当他销假赴职之际写这首诗，把官职看作束缚自己的羁绊。这种思想感情是和他后来所写的大量田园诗一致的。不过，在他归隐以后，经过躬耕的实践，这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诗中也就更明确了。他的许多杰出的代表作，都是归隐以后的产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归园田居》五首。在第一首中，诗人以兴奋的心情写出了田园景物的美好和他对归隐生活的热爱：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在这首诗里，诗人把隐居田园的生活和官场对立起来。他把仕途叫作“尘网”，深以离开这个“樊笼”为乐。在他心目中，恬静的农村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净土，是污浊官场的对立物，所以他不能不热情地加以歌唱。正由于他痛恨当时社会的黑暗，所以当他看到远处的农舍和几缕炊烟，听到几声鸡鸣狗吠，都在内心中产生“复得返自然”的喜悦。在他的笔下，“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这样平凡的事物，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这种未经矫揉造作的自然景致，确实蕴含着自然美，它本身就足以成为欣赏的对象。但是，诗人那种不愿同流合污的志趣和情操在这里给自然界增添了生气。因此，这种自然美反映到他的诗里，就显得更集中、更完满，能在广大读者心中引起深厚的美感。

当诗人尚未离开宦途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但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却从大自然里悟出了人生的真正意义，获得恬静的心境。陶渊明采菊于东篱之下，偶一抬头见到南山，山上的气象傍晚时越发可

爱，飞鸟一群群地结伴而还。他忽然从这景象联想到自己的归隐，悟出返朴守真的哲理，不胜欣慰。他本想说明白，却又不可言传。陶集中写飞鸟，除此以外，还有十三处，大都有比喻或象征的意义。用飞鸟飞向天路经受了风雨严寒的折磨，终于返回山林，喻指自己的出仕与归隐。而这种归隐的决心是很坚决的，他在《饮酒》其二中说：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继续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农村中安静的环境和美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诗人，甚至使他暂时地忘记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贫困。他在这种简朴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觉得自己“托身得所”，可以超然于污浊的现实之外，坚持自己的志趣和理想。这时他的心情是恬静的、愉快的。

他写了不少诗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他归隐后悠然自得的生活，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欢聚，他都感到愉快。如“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写田园的早晨，感受是何等新鲜！再如“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汎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第一首）莫不诗意盎然。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陶渊明的田园诗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来源于高洁的志趣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由于他在精神上有所寄托和执着，才能够真正做到“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在山林皋壤之中，无处不能找到乐趣。这样就更加强了他安贫乐道的操守，支持了他清高的理想。

陶渊明田园诗的另一部分，以极大的热情歌咏了农业劳动。他在《归园田居》第三首中，写出了劳动的感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短诗。是作者初回农村参加农田劳动时所写的。这时诗人虽以愉悦的心情描写了从早到晚的生产劳动景象，但劳动的艰辛已开始尝到。诗的尾联“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表示了他归隐务农的决心。诗中所说的“愿”，不是别的，是他终于脱离尘网，复归于自然；是他作为一个自食其力者对劳动成果的期望。

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不把劳动看作“下贱”的事，而且认为这样很符合他的心愿。这种思想在很多作品中都反映了出来。《怀古田舍》诗说：“平畴

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在田野风景和农事活动的描写中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由于诗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并由衷地喜爱它，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他的一些田园诗还表现了只有一个劳动者才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二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现了他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怀。《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表明他对于劳动的艰苦，已有了更深切的体验：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他认为衣食是人生的首要条件，不谋衣食就无法生存，自然更谈不上谋道了。而要谋衣食就要劳动。他主张人人劳动。这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劝农》诗说：“舜既躬耕，禹亦稼穡。远若周典，八政始食。”连圣贤都不废躬耕，何况一般人呢？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里，一开头便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孔子的遗训太高了，达不到，还是老老实实地种地吧！陶渊明的这种思想，突破了儒家鄙视劳动的观念，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劳动中陶渊明逐步地接近了农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说：“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正是在劳动中他同农民初步建立了感情。他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等名句历来为人们所盛赞，就是因为这里包含着长期劳动中所得到的体验和感情。宋代作家苏轼说：“平畴二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其实陶渊明的许多田园诗所以成为不朽的杰作，都是由于这种生活经验和感情之故。《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是陶渊明经历了十几年的农村生活所作：

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乘。遥谢荷蓑翁，聊得从君栖。

他对农业生产劳动的艰辛、农民生活的困苦已有深刻认识，他的思想感情与农民更接近了。这时，他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欣赏田园风光，而是像老农一样感受劳动的甘苦，对农业收成，既抱希望，也有忧虑。如《归园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陶渊明还有一小部分田园诗反映了农村的凋蔽和自己穷困的生活。《归园田居》

其四反映农村战后的荒凉景象：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徘徊丘陇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
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虽然是写诗人自己的生活，但通过它，我们可以间接地看到农民的贫困和疾苦：《杂诗》之四深刻地描述了农民生活疾苦状况，表示了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劳动者不得温饱的愤慨。诗中没有任何忿言词，但怨怒之情却充满全篇。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
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
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益，拙生失其方。
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乞食》写出了人在饥饿时的心理状态，诗人把依人寄食的思想活动、感觉变化写得细腻、委婉、真实、生动，非亲身经历感受者，是万万写不出来的：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
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
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我国古代反映贫穷饥饿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少，但像陶渊明这样饱含泪水血水的诗篇还不多见。它是陶诗中的佳作之一，也是我国古代闪耀现实主义思想艺术光辉的最好的诗歌。

尽管陶渊明接近了农民，然而陶渊明的劳动，与当时的农民在地主剥削下从事的牛马一般的劳动，还有本质的区别。他有门生，做彭泽令时有一力，归隐时有“僮仆欢迎”。在归隐的初期有农民替他担负主要的工作。他虽说要“聊为垄亩民”，但并不是真的要去做农民，而是要做长沮、桀溺之类躬耕的隐士。所以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遥谢荷蓑翁，聊得从君栖。”他在农村的知心朋友并不是农民，而是一些小官吏或隐居的知识分子，如郭主簿等。他同农民只能话桑麻，同他们则可以一起登高赋诗、欣赏诗文，表白自己的志趣而“言笑无厌时”。

《桃花源诗并记》是陶渊明田园诗的一个新发展，这是他晚年的作品。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到桃源，是诗人对理想的进一步探求。早年“大济苍生”的理想，在仕途上破灭了；他便把理想寄托在田园，隐居躬耕独善其身。在田园他经历了长期的劳动，生活日益贫困，归隐初期那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局面越来越难维持，他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饥寒的问题，同时也更多地了解了农民的思想愿望。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的社会理想便逐渐形成。桃花源是一个人人劳动，自给自足，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也是一个自由、富裕、安宁的社会。

诗人以极大的热情，从生产到生活，从自然环境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对桃花源做了十分全面的描绘。如果说陶渊明写《归园田居》和《归去来兮辞》的时候，还只注意他自己的生活和德操，而很少了解人民的痛苦和愿望，那么写《桃花源诗并记》的时候，他的心中已经想到农民了。桃花源不仅是隐士的小天地，也是千千万万劳动农民的乐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反映了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

然而，陶渊明并不能指出达到理想的道路，在他看来桃花源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神界”。他把农民的理想和他的隐逸思想融合在一起，桃源中的农民也变成和他类似的隐士了。

陶渊明的诗尽管以描写田园风光与隐逸生活为最著，他的好诗却远不止于此。陶渊明的咏怀、咏史诗，继承阮籍与左思的传统，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也曲折地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他原是有政治抱负的人，归隐本非他的素志。所以他虽然安贫守贱，把自己的志趣寄托到自然景物中去，但对政治的黑暗和自己抱负的无法实现终究不能完全遗忘。他的《饮酒》第十九首写出了自己的志节和行为：

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他公开地说出了自己归田里是由于社会黑暗。“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对于恶浊的现实流露出激愤的心情。他眼看年光的消逝，事业无成，不能不借酒来消愁。在《杂诗》、《读山海经》等组诗中的大部分诗都属于这一类。

表现壮志不能实现的，如《杂诗》其五回忆少年时的猛志，最后两句“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颇有自敬自勉之意。其二写他有志难骋的悲愤，说明他在隐居中内心仍然是十分苦闷的：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首诗从傍晚写到天明；从明月的冷寂写到内心的悲凄。特别是“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两句，把孤独的情状写得十分真切。他心里本有无数话要说，话到嘴边才觉察到身边无人，于是转向自己的身影劝酒。诗人用“挥杯劝孤影”这一不甘寂寞的行动，衬托内心的寂寞。“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这两句中的日、月，既指白日、素月而言，又指岁月时光而言。“掷”字颇有分量，似乎诗人本想挽留他们，追随他们，但还是被抛在了身后。岁月流逝得这样快，而自己的壮志却毫无施展的希望，诗人怎不心怀悲凄呢！从这首诗可以看出陶渊明心里藏着多么深广的忧愤。

正因为诗人怀抱着这样的牢骚，所以他特别同情那些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的失败

了的英雄人物。他的《咏荆轲》热烈地歌颂了反抗暴秦的刺客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诗人用“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形象，刻画出荆轲和他的朋友们在易水饯别时那种激昂的情绪。接着，他写出了荆轲入秦行刺时那种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最后归结为“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诗人不但为荆轲的失败而惋惜，而且对他表示了由衷的仰慕。

在组诗《读山海经》中，诗人也赞扬了许多壮烈的牺牲者，例如：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这首诗歌颂精卫与刑天的复仇精神，正是诗人自己疾恶抗暴的感情的表现。“猛志固常在”说明诗人济世的志向，永远不会熄灭。鲁迅把这类诗称做“金刚怒目式”，他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咏贫士》七首借古代贤人安贫守贱的事迹，抒写自己不求名利的情怀，也是陶渊明重要的作品。

在现实生活中，历经坎坷、遭受贫穷饥饿的陶渊明，并没有灰心丧气，对人类社会仍抱有希望，他幻想能够出现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下面这篇诗歌及其附记，就是诗人为其理想社会所描绘的蓝图：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躡轻风，高举寻吾契。

——《桃花源诗》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记》

这里，诗人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笔墨勾画出了一幅“世外桃源”的风景画，画中淳朴之风历历可见，真挚之情诚实感人，它是诗人理想的寄托，也反映了古代农民的思想愿望。桃花源的美好图景和当时人民在统治阶级无情压榨之下弄得家破人亡的血腥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对比下，使现实社会显得十分不合理。这正是诗人对当时现实的严厉批判。

《桃花源记》杰出的思想意义，不只是批判了当时的社会，而且还大胆地否定了君权。在那里，没有帝王，也就没有王朝的更迭。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汉、魏、晋三朝的历史在他们听来只值得叹惋而已。诗人这种思想和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鲍敬言的《无君论》的主张有着一脉相通的关系。但阮籍、鲍敬言都只认为“无君”是上古淳朴之世的现实，而陶渊明则用生动的形象，显示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民一样可以不要君主。这就更大胆、更富于进步意义。

陶渊明的愤世嫉俗和洁身自好固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这里包含有明哲保身和安分守己的思想。例如：“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时运》）、“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等诗句，就反映出那种逃避现实的情绪。尤其是以个人来反抗整个社会，他必然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且他的反抗也只能用归隐田园的办法。所以人生无常的宿命思想如“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第四首）等诗句在他作品中占着不小的比重。

陶渊明作品所以历来被传诵，和它的高度艺术成就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朴素、清新、自然、本色。这种风格的形成是由于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所决定的。陶渊明在诗歌写作上突破了六朝时期华而不实的审美要求，创造了一种清新自然、浑厚朴实的诗歌意境。他的诗篇中，明丽的田园风光、恬静的农民生活，是用平淡朴素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有如山涧清泉自然流淌，丝毫没有斧凿痕迹。这些诗，形象感很强，青山绿水，田野桃林，茅屋炊烟，鸡鸣犬吠，无不

给人以美感，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在六朝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注重形式主义的文坛，陶渊明的艺术风格有如奇峰突起，~~难能可贵~~。他没有受骈俪绮靡文风的影响，独辟蹊径，以挥洒自如、不事藻饰的文笔，抒写平澹自然、意味隽永的诗篇，在他所处的时代，无疑鹤立鸡群，独树一帜。遗憾的是，陶渊明的创作成就和审美追求，在当时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他生前没有受到重视，死后也长期默默无闻。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他只字不提，钟嵘的《诗品》也仅仅把他的诗列为中品。但是，陶渊明的创作成就不能抹煞，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陶渊明终于被发现、被认识了。钟嵘虽对陶诗评价不高，但以其鉴赏家、批评家的眼力还能发现陶诗的朴素美，说过几句公道话：“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唐宋以来，陶渊明受到普遍的称赞。白居易在《题浔阳楼》诗中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苏轼在《与苏辙书》中写道：“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龚自珍写诗赞誉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竞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沈德潜说陶渊明是“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而独立”。梁启超说，陶渊明的诗“都是从深痛幽怨发出来，个个字带着泪痕”。

从前人评陶诗，往往用“平淡”、“自然”等话来概括其风格。这些评语确实道出了陶诗的一个重要特色。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醇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像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这是只有经过亲身体验与深切感受之后才能写出的诗句。又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平淡无奇的八句诗却写出一片生动的田园生活的声音和气氛。苏轼说陶诗“似癯实腴”，正好说明了这个特点。但陶诗所以具有高度的艺术魅力，并不仅仅由于它平淡。

前面已经说过，陶渊明的笔端常常饱和着自己长期的农村生活经验，这是他的田园诗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根本原因。除了生活经验以外，他的写景作品中还往往体现出诗人自己的性格。例如：《和郭主簿》第二首中的松、菊；《饮酒》第八首中的松树；《咏贫士》第一首中的孤云；《归鸟》和《饮酒》第四首中的飞鸟等自然景物的形象，都是作者那种孤高傲世不愿同流合污的人格的象征。又如《读山海经》第一首和《归园田居》第一首，虽然主要是描写居住环境和自然景物，对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着墨不多，只点了“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或“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等几句，但诗人的声音笑貌已跃现在纸上。这种作品把抒情和写景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就是前人说的“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由于作者在描写这些自然景物时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景物的形象也显得更完美、更生动。钟嵘《诗品》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正是从这里看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

陶渊明作品所以能引人入胜的另一原因，就是他的诗歌还富有意境。这在他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很不相同。谢诗往往只给人一幅幅客观的山水画面，陶诗却在使人接触到田园生活画面的同时，而引入到一种境界中去。如前引的《归园田居》第一首，我们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一切还构成一种境界，它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诗人的创作方法密切相关。诗人写作田园诗，目的并不在于客观地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象，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潜移默化，使人们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中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在艺术上又与汉魏诗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不谋而合。这类诗篇给人的印象就是更和谐、更优美。

陶渊明的诗都是在不得不形诸笔墨时才写出来的。这样的诗句都是作者肺腑之言，同那些缺乏真实感受而硬写的作品有天渊之别。

此外，简洁和含蓄也是陶诗的重要优点。陶渊明的诗都是短短的抒情之作，绝少冗长的描写，更没有空泛的议论。其中的代表作如《归园田居》、《咏贫士》等都使人感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钟嵘评陶诗说“殆无长语”，正是针对这种情形而言。这也是他同时许多诗人所不可企及的。

上面的分析只是就陶诗一般的特点而论。如果更具体地探讨陶渊明的全部诗歌，则各种不同内容的诗歌，也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例如：《饮酒》第五首和《咏荆轲》，《读山海经》第一首和第八首，不论从创作方法或艺术风格上说，都有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一方面决定于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作者多方面的才能。

他的诗歌虽然在晋宋之间自成一格，自然流露，不假雕饰。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看出古诗、曹植、阮籍、左思对他的潜在影响。像《拟古》的“日暮天无云”等“风华绮靡”的诗中，显然融合了曹植的辞采。“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的《饮酒》诗，精神面目和阮籍《咏怀》非常接近，而他的《咏贫士》、《咏荆轲》等诗，又显然是受了左思《咏史》的启发。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又协左思风力”，是十分正确的。

除了诗歌以外，陶渊明也擅长散文与辞赋。他的散文也像诗歌一样，以朴素的语言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绝无当时一般作家的雕琢气息。例如：前面谈到过的《桃花源记》，用白描的手法勾划出他那乌托邦的理想。他把桃花源写得那样美好与淳朴，

使历来不少读者为之神往。这不仅由于思想本身的进步性，也由于文章的生动和富于形象。另一篇著名的散文《五柳先生传》则是作者的自我写照，通过简洁的文字，把自己的性格生动地呈现在纸上。五柳先生的形象一直是过去有进步理想的知识分子们所企慕的人物：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酬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传》

这篇散文中的“五柳先生”既是陶渊明的自况，也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五柳先生传》写得极平淡自然，看似随意挥洒，未尝经意，却把“五柳先生”的高志和奇趣生动形象的表现出来。

《与子俨等疏》则是作者的一篇遗嘱。在这篇文章中，吐露了他“质性自然”和“与物多忤”的性格与志趣。《自祭文》历来被认为是他的绝笔。在死生面前，他认识到这是自然的规律，显得很乐观、放达，绝无颓唐、伤感的情调。此外，一些诗赋的序，虽然常是寥寥数语，也富于情趣。如诗《有会而作》和辞赋《归去来辞》的序，不论从形象性和抒情气氛来说，都可以说是散文诗。

《归去来兮辞并序》如下：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悼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